

主编◇陈文新

本卷主编◇陈文新

中国文学编年史

明
中
期
卷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主编◇陈文新

本卷主编◇陈文新

中国文学编年史

明
中
期
卷

靈中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编年史. 明中期卷 / 陈文新主编; 陈文新分册主编.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9

ISBN 7-5438-4534-2

I. 中... II. ①陈...②陈... III. ①文学史—编年史—中国—明代 IV.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7663 号

中国文学编年史·明中期卷

责任编辑: 李建国 胡如虹 曹有鹏

杨 纯 邓胜文 张志红 聂双武

主 编: 陈文新

书名题字: 卢中南

装帧设计: 陈 新

出 版: 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市场营销: 0731-2226732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邮 编: 410005

制 作: 湖南潇湘出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 话: 0731-2229693 2229692

印 刷: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4 1/16

印 张: 40

字 数: 883,000

书 号: ISBN 7-5438-4534-2/I · 451

定 价: 296.00 元

《中国文学编年史》编纂委员会

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卞孝萱 邓绍基 冯其庸 曹道衡 傅璇琮
霍松林

主编 陈文新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石观海 李建国 汪春泓 陈文新 张思齐
张玉璞 於可训 赵伯陶 赵逵夫 胡如虹
诸葛忆兵 曹有鹏 熊治祁 熊礼汇 霍有明

本卷撰稿人

陈文新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国家985建设项目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



目 录

总序	1
凡例	1
绪论	1

第一章 明武宗正德十六年至明世宗 嘉靖二十七年（1521—1548）共 28 年

引言	1
公元 1521 年（武宗正德十六年 辛巳）	3
公元 1522 年（世宗嘉靖元年 壬午）	16
公元 1523 年（世宗嘉靖二年 癸未）	22
公元 1524 年（世宗嘉靖三年 甲申）	32
公元 1525 年（世宗嘉靖四年 乙酉）	41
公元 1526 年（世宗嘉靖五年 丙戌）	47
公元 1527 年（世宗嘉靖六年 丁亥）	56
公元 1528 年（世宗嘉靖七年 戊子）	64
公元 1529 年（世宗嘉靖八年 己丑）	72
公元 1530 年（世宗嘉靖九年 庚寅）	80
公元 1531 年（世宗嘉靖十年 辛卯）	83
公元 1532 年（世宗嘉靖十一年 壬辰）	91
公元 1533 年（世宗嘉靖十二年 癸巳）	98
公元 1534 年（世宗嘉靖十三年 甲午）	101



公元 1535 年 (世宗嘉靖十四年 乙未)	109
公元 1536 年 (世宗嘉靖十五年 丙申)	120
公元 1537 年 (世宗嘉靖十六年 丁酉)	125
公元 1538 年 (世宗嘉靖十七年 戊戌)	133
公元 1539 年 (世宗嘉靖十八年 己亥)	140
公元 1540 年 (世宗嘉靖十九年 庚子)	147
公元 1541 年 (世宗嘉靖二十年 辛丑)	155
公元 1542 年 (世宗嘉靖二十一年 壬寅)	164
公元 1543 年 (世宗嘉靖二十二年 癸卯)	172
公元 1544 年 (世宗嘉靖二十三年 甲辰)	180
公元 1545 年 (世宗嘉靖二十四年 乙巳)	187
公元 1546 年 (世宗嘉靖二十五年 丙午)	192
公元 1547 年 (世宗嘉靖二十六年 丁未)	197
公元 1548 年 (世宗嘉靖二十七年 戊申)	207

第二章 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至 明穆宗隆庆六年 (1549—1572) 共 24 年

引言	212
公元 1549 年 (世宗嘉靖二十八年 己酉)	216
公元 1550 年 (世宗嘉靖二十九年 庚戌)	220
公元 1551 年 (世宗嘉靖三十年 辛亥)	226
公元 1552 年 (世宗嘉靖三十一年 壬子)	235
公元 1553 年 (世宗嘉靖三十二年 癸丑)	242
公元 1554 年 (世宗嘉靖三十三年 甲寅)	251
公元 1555 年 (世宗嘉靖三十四年 乙卯)	259
公元 1556 年 (世宗嘉靖三十五年 丙辰)	269
公元 1557 年 (世宗嘉靖三十六年 丁巳)	276
公元 1558 年 (世宗嘉靖三十七年 戊午)	283
公元 1559 年 (世宗嘉靖三十八年 己未)	292
公元 1560 年 (世宗嘉靖三十九年 庚申)	307
公元 1561 年 (世宗嘉靖四十年 辛酉)	315

公元 1562 年 (世宗嘉靖四十一年 壬戌)	320
公元 1563 年 (世宗嘉靖四十二年 癸亥)	326
公元 1564 年 (世宗嘉靖四十三年 甲子)	333
公元 1565 年 (世宗嘉靖四十四年 乙丑)	341
公元 1566 年 (世宗嘉靖四十五年 丙寅)	350
公元 1567 年 (穆宗隆庆元年 丁卯)	359
公元 1568 年 (穆宗隆庆二年 戊辰)	365
公元 1569 年 (穆宗隆庆三年 己巳)	371
公元 1570 年 (穆宗隆庆四年 庚午)	379
公元 1571 年 (穆宗隆庆五年 辛未)	386
公元 1572 年 (穆宗隆庆六年 壬申)	393

第三章 明神宗万历元年至 万历二十八年 (1573—1600) 共 28 年

引言	398
公元 1573 年 (神宗万历元年 癸酉)	401
公元 1574 年 (神宗万历二年 甲戌)	408
公元 1575 年 (神宗万历三年 乙亥)	415
公元 1576 年 (神宗万历四年 丙子)	420
公元 1577 年 (神宗万历五年 丁丑)	424
公元 1578 年 (神宗万历六年 戊寅)	434
公元 1579 年 (神宗万历七年 己卯)	438
公元 1580 年 (神宗万历八年 庚辰)	446
公元 1581 年 (神宗万历九年 辛巳)	454
公元 1582 年 (神宗万历十年 壬午)	458
公元 1583 年 (神宗万历十一年 癸未)	466
公元 1584 年 (神宗万历十二年 甲申)	474
公元 1585 年 (神宗万历十三年 乙酉)	481
公元 1586 年 (神宗万历十四年 丙戌)	487
公元 1587 年 (神宗万历十五年 丁亥)	497
公元 1588 年 (神宗万历十六年 戊子)	506
公元 1589 年 (神宗万历十七年 己丑)	520



公元 1590 年 (神宗万历十八年 庚寅)	529
公元 1591 年 (神宗万历十九年 辛卯)	536
公元 1592 年 (神宗万历二十年 壬辰)	541
公元 1593 年 (神宗万历二十一年 癸巳)	549
公元 1594 年 (神宗万历二十二年 甲午)	557
公元 1595 年 (神宗万历二十三年 乙未)	563
公元 1596 年 (神宗万历二十四年 丙申)	572
公元 1597 年 (神宗万历二十五年 丁酉)	577
公元 1598 年 (神宗万历二十六年 戊戌)	585
公元 1599 年 (神宗万历二十七年 己亥)	591
公元 1600 年 (神宗万历二十八年 庚子)	596
 参考书目和引用书目	 602
人名索引	606



总序

纪传体、编年体是中国传统史书的两种主要体裁，而编年体的写作远较纪传体薄弱。《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史部编年类小序已明确指出这一事实：“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荀悦又改纪传为编年。刘知幾深通史法，而《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则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其不列为正史者，以班、马旧裁，历朝继作。编年一体，则或有或无，不能使时代相续。故姑置焉，无他义也。”^①与古代历史著作的这种体裁格局相似，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中，也是纪传体一枝独秀，不仅在数量上已多到难以屈指，各大专院校所用的教材也通常是纪传体，这类著作的核心部分是作家传记（包括作家的创作经历和创作成就）。编年类的著作，则虽有陆侃如、傅璇琮、曹道衡、刘跃进等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就总体而言，仍有大量空白，尤其是宋、元、明、清、现、当代部分，历时一千余年，文献浩繁，而相关成果甚少。这样一种状况，自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套十八卷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出版，即旨在一定程度地改变这种状况。

文学史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中展开的。纪传体的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以若干个焦点（作家）为坐标，对文学史流程的把握注重大体判断。其优势在于，常能略其玄黄而取其隽逸，对时代风会的描述言简意赅，达到以少许胜多许的境界。若干重要的文学史术语如“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大历诗风”等，就是这种学术智慧的凝

^① 永瑤等撰：《四库全书总目》，第4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结。但是，由于风会之说仅能言其大概，“个别”和“例外”（即使是非常重要的“个别”和“例外”）往往被忽略，不免留下遗憾。一些跨时代的作家，如李煜、刘基、张岱等人，在文学史中的时代归属与其代表作的实际创作年代也常有不吻合的情形。例如，李煜被视为南唐作家，而他最好的词写在宋初；刘基被视为明代作家，而他最好的诗、文写在元末；张岱被视为明代作家，而其代表作多写于清初。比上述情形更具普遍性的，还有下述事实：我们讲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往往以毛宗岗修订本为例；我们讲施耐庵的《水浒传》，往往以百回繁本为例；我们讲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往往以崇祯本为例。这就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讲的并不是作家的原著；第二，我们忽略了读者的接受情形。这类涉及风会与例外、作家时代归属与作品实际创作、传播与接受两方面的问题，以纪传体来解决，由于受到体例的限制，往往力不从心，采用编年体，解决起来就方便多了：不难依次排列，以展开具体而丰富多彩的历史流程。

与纪传体相比，编年史在展现文学历程的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在时代风会的描述和大局的判断上，则远不如纪传体来得明快和简洁。作为尝试，我们在体例的设计、史料的确认和选择方面采用了若干与一般编年史不同的做法，以期在充分发挥编年史长处的同时，又能尽量弥补其短处。我们的尝试主要在三个方面：其一，关于时间段的设计。编年史通常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下辖月，月下辖日。这种向下的时间序列，可以有效发挥编年史的长处。我们在采用这一时间序列的同时，另外设计了一个向上的时间序列，即：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这种向上的时间序列，旨在克服一般编年史的不足。具体做法是：阶段与章相对应，时代与卷相对应，分别设立引言和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现当代文学因时间周期较短，拟省略阶段，不设引言）。其二，历史人物的活动包括“言”和“行”两个方面，“行”（人物活动、生平）往往得到足够重视，“言”则通常被忽略。而我们认为，在文学史进程中，“言”的重要性可以与“行”相提并论，特殊情况下，其重要性甚至超过“行”。比如，我们考察初唐的文学，不读陈子昂的诗论，对初唐的文学史进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了解；我们考察嘉靖年间的文学，不读唐宋派、后七子的文论，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观就不可能有准确的把握。鉴于这一事实，若干作品序跋、友朋信函等，由于透露了重要的文学流变信息，我们也酌情收入。其

三，较之政治、经济、军事史料，思想文化活动是我们更加关注的对象。中国文学进程是在中国历史的背景下展开的，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均有显著联系，而与思想文化的联系往往更为内在，更具有全局性。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有意加强了下述三方面材料的收录：重要文化政策；对知识阶层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思想文化经典的撰写、出版和评论。这样处理，目的是用编年的方式将中国文学进程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思想文化变迁一并展现在读者面前。

《中国文学编年史》是一个基础性的重大学术工程，文献的广泛调查和准确使用是做好编纂工作的首要前提。《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丛书集成》、《笔记小说大观》等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典籍，近人和今人整理出版的别集、总集，大量年谱（如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以及文、史、哲方面的编年史，均在参考范围之内，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注明，谨此一并致谢。在使用上述文献的过程中，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态度。这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典籍是由我们第一次标点，这一工作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前人已经整理的典籍，我们也并不直接采用，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再整理一次。这样做当然增加了工作量，但确有许多好处，若干错误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纠正的，有些错误的纠正涉及基本事实的澄清。比如，张大复《皇明昆山人物传》卷八记梁辰鱼晚年情形，有云：“（梁氏）当除夕遇大雪，既寝不寐。忽令侍者遍邀诸年少，载酒放歌，绕城一匝而后就睡。曰：‘天为我辈雨玉，可令俗人蹴踏之耶？’时年已七十矣。亡何，中恶，语不甚了。有老奴李用者，颇省其说，尚有注记。得岁七十有三。”一位学者将“中恶，语不甚了”标点为“中恶语，不甚了”，并就此推论说：“梁辰鱼七十岁时遭遇暧昧不明的事件。”“《皇明昆山人物传》的上述记载本意是为贤者讳，事实上倒很可能为统治者隐盖了迫害异己文人的一件罪行。”这就不免弄错了事实。“中恶”即突然患急病，正所谓“老健春寒秋后热”，老年人得急病是常见的情形。而“中恶语”的表述，明显不符合古人的语言习惯。再如，陈田《明诗纪事》将正德时期的傅汝舟与明末的傅汝舟混为一谈，将两人的生平搅在一起，其按语云：“丁戊山人诗初矜独造，晚遁荒诞，择其人格者录之，亦是幽弦孤调。山人享大年，具异才，谈佛谈仙，亦作北里中艳语。初与郑少谷游，晚乃与茅止生、卓去病、张文寺、文太青倡和，支离怪

诞，无所不有。少谷集中无是也。论者乃专谓山人刻意学少谷，何哉？”《明诗纪事》近三百万言，卓有建树，是研究明诗的必备案头书。但关于傅汝舟，陈田的确弄错了。郑善夫（1485—1523）号少谷，以学杜著称，学郑少谷的是正德年间的傅汝舟；文翔凤号太青，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与文太青等唱和的是明末的傅汝舟。两个傅汝舟之间相距约百年，陈田想当然地将二者合为一人，说他“享大年”，又说他前期学郑少谷，后期学竟陵派，曲意弥缝，令人哑然失笑。其他种种，如部分文学家辞典对作家生卒年的误注，若干点校本的断句错误等，我们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纠正。提到这些情况，不是想证明我们的水平有多高，而意在告诉读者：我们的工作态度是认真的，有志于为读者提供一部值得信赖的编年史著述。

《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得到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华书局、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单位专家和领导，尤其是武汉大学领导的支持；湖南省新闻出版局、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及湖南人民出版社鼎力支持编年史的编纂出版，所有这些，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陈文新

2006年7月23日于武汉大学

凡 例

一、《中国文学编年史》以编年形式演述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凡十八卷：第一卷周秦、第二卷汉魏、第三卷两晋南北朝、第四卷隋唐五代（上）、第五卷隋唐五代（中）、第六卷隋唐五代（下）、第七卷宋辽金（上）、第八卷宋辽金（中）、第九卷宋辽金（下）、第十卷元代、第十一卷明前期、第十二卷明中期、第十三卷明末清初、第十四卷清前中期（上）、第十五卷清前中期（下）、第十六卷晚清、第十七卷现代、第十八卷当代。

二、编年史各卷据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划分为若干章（如无必要，或不分章）。章的标目方式是：“××章 ××年至××年，共××年”。关于某一阶段文学的总体评论放在该章的首年之前，如明前期卷“第一章 洪武元年至建文四年，共35年”，在章目下，“洪武元年”之前，单列明前期卷“引言”一目。关于某一时代文学的综合论述，放在卷首。如元代卷，在第一章前，单列元代文学“绪论”。

三、编年史各卷所收录内容的构架大体统一，重点包括七个方面：1. 重要文化政策；2. 对文学发展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3. 作家交往（唱和、社团活动等）；4. 作家生平事迹；5. 重要作品的创作、出版和评论；6. 争鸣（团体之间、个人之间在重要问题上的论辩等）；7. 其他。

四、叙事以纲带目，即在征引相关文献之前有一句或数句概述。如，先总叙一句“俞宪编《盛明百家诗》成书”，再征引相关序跋、著录、评议。前者为纲，后者为目，纲、目配合，旨在完整地呈现文学史事实。少量见于常用工具书的重要史实，或不必展开的文学史事实，则列纲而略目，以省篇幅。

五、公历纪年年初与中国传统纪年年末不属同一年份，如公元1899年元月1日至12月31日对应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一月二十九日，而不对应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正月初一至十二月三十日。我们采用变通的处理方法，以公历纪年，而以农历纪月，比如，凡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正月至十二月之内的内容均置于公元1899年下。作家生卒年，仍据公历标注，其他以此类推。现、当代文学部分，纪年、纪月均据公历。

六、同一年内之文学史实，按月份先后顺序排列。月份不详而仅知季度的，春季置于三月之后，夏季置于六月之后，其他以此类推。季度、月份均不详者，另设“本年”目统之。

七、一部分重要文学史实，年月不详而仅知大体时段者，在年号之末另设“××年间”目统之，如嘉靖四十五年之后另设“嘉靖年间”一目。

八、引用序跋，一般采用“作者+篇名”的方式，如“臧懋循《唐诗所序》”。引用序跋之外的诗文等作品，一般采用“集名+卷次+篇名”的方式，如“《有学集》卷三一《隐湖毛君墓志铭》”，采用“作者+篇名”的方式，如“钱谦益《隐湖毛君墓志铭》”。无篇名者则省略，如“《艺苑卮言》卷三”。某作者集中所收为他人别集所作的序跋，亦采用这一方式，如“《太函集》卷二二《弇州山人四部稿序》”。引用正史，一般采用“正史名+本传或××传”的方式，“如《明史》本传”或“《明史》李攀龙传”，不标卷次。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用全称，或简称“四库提要”，只标明卷次。如“四库提要卷一五三”。引用地方志，标明纂修年代，如“光绪《乌程县志》卷三一”。据类书转引时，注明原出处，如“《太平广记》卷二〇《阴隐客》（出《博异志》）”。引用报刊，注明年月日或卷次。

九、作者小传一般置于生年。有些作家，虽生年在上一卷，但在上一卷无文学活动，其小传酌情移入本卷首次出现时。如杨士奇，元亡时才4岁，其小传置于明前期卷，出生时只交代：“杨士奇（1365—1444）生”，不列小传。现、当代作者，因传记资料常见，相关作家小传酌情收录。

十、对于某一作家的总体评论和重要著录一般置于卒年。某作者卒年在下一卷，但在下一卷无重要文学活动，主要评论材料酌情置于本卷。如易顺鼎（1858—1920），其评论材料集中于晚清卷，不入现代卷。

十一、作家代表作一般不录原文，但收录重要评论材料，并酌情说明相关选本收录情形。

十二、需要补充交待而占用篇幅较大的文学史事实，设少量“附录”。对若干需要辨证的史实，设按语加以说明。以提供文献线索为主，不详加征引。



绪论

李维桢《邓使君诗序》：盖高庙起淮甸，都金陵，于时诗道之兴，自南服始。高、杨、张、徐诸君子，吴越产也。闽则有十才子应之。文庙起燕甸，一再传，遂定都焉。诗道之兴，在北为盛。何、李、边、薛诸君子，皆关河齐鲁产也。闽则有郑善夫应之。世庙起郢甸，享国最久，制礼作乐，功冠本朝。诗道之盛，复自北而南。于时七子辈强半南人，而闽未有应者。乃今则汝高其人哉！国初诗纤秣绮縠，犹有元之结习，变者务为和平典畅，而其流失之猥鄙。弘、正之际，变者务为钜丽雄深，而其流失之粗厉。嘉、隆之代，变者始一归于正，名家大家，具有唐人之美，而盛衰之机实相倚伏。（《大泌山房集》卷十九）

邹迪光《王友上诗集序》：我明布衣盛称诗，乃自孙太白一元、谢茂秦榛、卢次梗（当作梗）枏、王（黄）淳父姬水、余（俞）仲蔚允文、沈嘉则明臣六七君子而外，不数数也……今吾友上诗，不知其于六七君子何如？大要不剽袭，不辘集，不时自迁改，不篇自矛盾，总之，春容尔雅，宣朗鬯达，而自成其为诗，有过于今之布衣者。（《调象庵稿》卷二十七）

袁宏道《叙姜陆二公同适稿》：苏郡文物，甲于一时。至弘、正间，才艺代出，斌斌称极盛，词林当天下之五。厥后昌谷少变吴歙，元美兄弟继作，高自标誉，务为大声壮语，吴中绮靡之习，因之一变。而剽窃成风，万口一响，诗道寝弱。至于今市贾佣儿，争为讴吟，递相临摹，见人有一语出格，或句法事实非所曾见者，则极诋之为野路诗。其实一字不观，双眼如漆，眼前几则烂熟故实，雷同翻复，殊可厌秽。故余往在吴，济南一派，极其呵斥，而所赏识，皆吴中前辈诗篇，后生不甚推重者。高季迪而上无论，有以事功名而诗文清警者，姚少师、徐武功是也。铸词命意，随所欲言，宁弱无缚者，吴文定、王文恪是也。气高才逸，不就羁绁，诗旷而文者，洞庭蔡羽是也。有为王、李所摈弃，而识见议论卓有可观，一时文人望之不见其崖际者，武进唐荆川是也。文词虽不甚奥古，然自辟户牖，亦能言所欲言者，昆山归震川是也。半趋时，半学古，立意造词，时出己见者，黄五岳、皇甫百泉是也。画苑书法，精绝一时，诗文之长因之而掩者，沈石田、唐伯虎、祝希哲、文徵仲是也。其它不知名，诗文可观者甚多。大抵庆、历以前，吴中作诗者，人各为诗；人各为诗，故其病止于靡弱，



而不害其为可传。庆、历以后，吴中作诗者，共为一诗；共为一诗，此诗家奴仆也，其可传与否，吾不得而知也。（《袁宏道集笺校》卷十八）

梅守箕《涉江诗序》：明之称诗者众矣，由成、弘前而论，不胜靡焉，惟虑其不似古也；论正、嘉而后，人人务振跃之，惟虑其似古也；隆、万以来，纷然自为跳（逃）逸，乃似古而益不似古也。此何以故？以其非诗人而为诗人也。……盖昔之靡者，沿于习也；其振跃之者，工于拟也；其自为跳（逃）逸者，益之以多闻旁搜而已也。自其为汉魏人而似之，则轻议六朝，自其为初盛唐而似之，则轻议中晚，是何诗道之捷乎？于是无不朔操觚而望即以名家者，此无它，非诗人而为诗人故也。（《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

费元禄《明文选序》：我国家稽古崇文，德泽之深唐虞，制度之法周官，更仆未易数。而文章之选有唐宋元未易及者。高皇帝神武天授，生目不知书，渡江以后，睿藻焕发。仁宗在东宫已好欧氏之文，圣学最为渊博。宣宗神敏，每遇试南宫，自草程序。历圣在宥，风励弥至，以故公卿大夫韦布缝掖咸自濯濯洗发，致意于古作者，思自媚于明时，而最达者亡过宋文宪、杨文贞、李文正、王文成。文宪机轴自出，敷腴朗鬯。文贞出欧阳，体贵台阁。文正稔于杨，简于宋，而法与学不足。文成超逸，一搦管辄自斐然，而辞达为宗，不取工匠。嗣此则王祿、胡翰、方希古、解大绅、丘文庄、吴文定、祝允明之流，翩翩翼鸣，更相彪炳。总之格不及古，搜不入深，室不出韩柳欧苏曾王，堂不窥班杨左马，优于才而惮于结撰云尔。更孝庙而后，北地崛起，披榛荒，斩荆棘，遂辟大雅之途。而信阳继起，康德涵、崔子钟、陆浚明、王晋江之徒，羽翼流派。至世庙而历下登坛，金声玉振，佐以元美、子相、子与、明卿、公实，鞭弭左右，驰骋中原。而新安搜剔诸子，原本六经，后先相望，超韩柳欧苏曾王之乘，而埒左马班杨之业。天地开辟，日月重朗，诂不媿哉。大抵创业之初，沿习未尽，中兴之后，黼黻有基。由质而文，则文而彬郁。由创则北地为政，而信阳、晋江为配。由中兴则历下为政，而江左、新安为配。或类有同方，或体有各至，杓之百家之前，衍之《国语》、西京之后，其斯一当衡石焉。盖元美有言曰：国初之业，濂溪为冠，乌伤称辅。台阁之体，东里辟源，长沙导流。先秦之则，北地反正，历下极深，新安见裁。理学之逃，阳明造基，晋江、昆陵藻悦。六朝之华，昌谷示委，勉之扬澜。大要尽之矣。（《甲秀园集》卷二十五）

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十四：先进后进，趋尚不同，大都皆由矫枉之过。成化以还，诗歌颇为率易，献吉、仲默、昌谷矫之，为杜为唐，彬彬盛矣。下逮于鳞，古仿汉魏，律法初唐，愈工愈精。然终不能无疑者，乃于古诗、乐府悉力拟之，靡有遗什，律诗多杂长语，二十篇而外，不奈雷同。于是中郎继起，恣意相敌，凡稍为近古者，靡不掊击，海内翕然宗之，诗道至此为大厄矣。黄锡余谓：“世有于鳞，必有中郎。”亦甚有见也。

《曲品》卷上：陆采（天池），江都人。张凤翼（灵墟），长洲人。顾大典（道行），吴江人。梁辰鱼（伯龙），昆山人。郑若庸（虚舟），昆山人。梅鼎祚（禹金），宣城人。卜世臣（蓝水，一字大荒），秀水人。叶宪祖（桐柏），余姚人。……此八君者，或为山人先达，或为先辈诸生。绮思灵心，各擅风流之致；寄惊赋感，共标游戏



之奇。如张，如郑，尤所服膺；如卜，如叶，素相友善。允为上之中。（《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李雯《皇明诗选序》：洪、永之初，草昧云雷，灵台偃革，艺林未薙，而精英澄湛之风，已魄已兆。时则有季迪、伯温唱之，而袁、杨诸公和之。皆颀然特起，才颖初见，虽腾蹕甫惊，而流风不竞，俚者犹元，腐者犹宋。至于弘、正之间，北地、信阳，起而扫荒芜，追正始，其于风人之旨，以为有大禹决百川、周公驱猛兽之功，一时并兴之彦，蜚声腾实，或咏或歌，此前七子之所以扬丕基也。然而二氏分流，各有疆畛，劲者乐李之雄高，秀者亲何之明婉，盖才流竞爽，而风调不合者，又三四十年。然后济南、娄东出，而通两家之邮，息异同之论。运材博而构会精，譬荆棘之既除，又益之以涂茨，此后七子之所以扬盛烈也。自是而后，雅音渐远，曼声并作，本宁、元瑞之俦，既夷其樊圃，而公安、竟陵诸家，又实之以萧艾蓬蒿焉。神、熹之际，天下无诗者盖五六十年矣。（《皇明诗选》卷首）

贺熙龄《重刻梨云馆本袁中郎集叙》：有明一代，作者林立，自李献吉、何仲默倡为复古之说，李于鳞、王元美嗣起，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英词壮气，凌厉无前，其弊也模拟过甚，真意渐漓，而一时靡然景仰附从，犹如斗之有勺，山之有岱也。独公安袁中郎先生不相推奉，而矫之以清新宕逸之辞，其时风气一变。虽其后亦时有胜有不胜，而先生之沉识定力，不苟随俗波靡以取悦当世，可不谓豪杰之士欤！……顾余窃思，当王、李焰炽之时，归震川亦昌言排之，而矫之以欧、曾之文，嗣是言文者首震川，而言诗者则宗公安，迄今震川之学传之者众，而公安之绪渐微，岂有幸有不幸欤？抑将有待而然欤？（《袁宏道集笺校》附录）

黄宗羲《明文案序》下：有明文章正宗，盖未尝一日而亡也。自宋、方后，东里、春雨继之，一时庙堂之上，皆质有其文，景泰、天顺稍衰，成、弘之际，西涯雄长于北，匏庵、震泽发明于南，从之者多有师承。正德间，余姚之醇正、南城之精练掩绝前作。至嘉靖而昆山、昆陵、晋江者起，讲究不遗余力，大洲、浚谷相与犄角，号为极盛。万历以后又稍衰，然江夏、福清、秣陵、荆石，未尝失先民之矩矱也。崇祯时，昆山之遗泽未泯，娄子柔、唐叔达、钱牧斋、顾仲恭、张元长皆能拾其坠绪，江右艾千子、徐巨源、闽中曾弗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石斋以理数润泽其间，计一代之制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学力为浅深，其大旨罔有不同，顾无俟于更弦易辙也。自空同出，突如以起衰救弊为己任，汝南何大复友而应之，其说大行。夫唐承徐庾之汨没，故昌黎以六经之文变之，宋承西昆之陷溺，故庐陵以昌黎之文变之，当空同之时，韩欧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矫为秦汉之说，凭陵韩欧，是以旁出唐子，窜居正统，适以衰之弊之也。其后王、李嗣兴，持论益甚，招徕天下，靡然而为黄茅白苇之习，曰：古文之法亡于韩，又曰：不读唐以后书。则古今之书去其三之二矣。又曰：视古修辞，宁失诸理。六经所言惟理，抑亦可以尽去乎？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雾而死者，大概便其不学耳。虽然，今之言四子者，目为一途，其实不然。空同沿袭《左》《史》，袭《史》者断续伤气，袭《左》者方板伤格；弇州之袭《史》，似有分类套括，逢题填写；大复习气最寡，惜乎未竟其学；沧溟孤行，则孙樵、刘蜕之舆台耳。四子所造不同途，其好为议论则一，姑借大言以吊诡，奈何世之耳目易欺也。鄮人君房、纬真